

回憶簡帛整理

——唐山大地震前後

李均明

1974年初，國家文物局組織了“簡帛整理小組”，從北京及全國各地抽調專家，對當時剛出土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及馬王堆漢墓帛書進行整理。當年秋天，我和駢宇騫學友一起以實習生的名義跟隨朱德熙、裘錫圭兩位先生來到紅樓。在裘錫圭先生的直接指導下，我們參加了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整理，工作中亦經常得到曾憲通先生的具體指教，收穫頗豐，後來我曾以當時所學為基礎，發表了《孫臏兵法譯注》一書。

1975年秋大學畢業後，在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先生及文物出版社社長高履芳女士的幫助下，把我留在了“整理小組”，使我有幸終生與簡牘結緣，故至今仍深深懷念兩位已故前輩，謹此向他們深深鞠躬！

這次分配後，我的編制在文物出版社，角色變了，領導明確交代我是作為文物出版社的工作人員為“整理小組”服務的，所以承攬了許許多多的雜事，最主要的是協助專家工作，如編輯拼貼圖版、抄寫稿件、校對、跑工廠，甚至保管過銀雀山漢簡的部分殘片。此外，到車站接送專家，大清早排隊為大家買火車票、報臨時戶口，乃至加班時為大家買夜宵，都是我分內的事，慶幸自己能有這樣的機會廣泛與大家接觸，常年接受各種不盡相同的治學方法的熏陶，令我吸收了必須的學術營養。尤其唐山大地震前後大家的作為，充分地展現了人性之善美、學者之風範，對我的心靈產生過極大的震撼。

1976年7月28日3時許，唐山發生大地震，北京有強烈震感。當時我及許多外地來京的整理組成員都住在紅樓地下室，地震時床架吱吱作響，臉盆都被摔出架外，驚醒後，大家相互招呼著，匆忙跑出紅樓外，站在五四大街開闊處，習慣性回望時，祇見紅樓樓體中部偏東的磚牆從四樓至二樓處已縱向開裂出一道裂縫，紅樓頓成危樓，天蒙蒙亮時即被封鎖，禁止入內。亦在此時，約五時許，李學勤先生卻從遠處的家中

趕過來，和金沖及先生一起，經多番交涉，衝上紅樓四層，對放置在那裏的定縣漢簡實物進行搶救保護處理，而那時正餘震不斷。定縣漢簡是所有出土簡牘中最脆弱的，因為出土這批簡的墓葬曾被火燒，所以所謂的定縣漢簡祇是一根根的木炭，完全無彈性，一碰就斷。當初爲了工作方便，這批簡按數十枚爲單元放置在一紙盒裏，然後將衆多紙盒交疊碼放。地震時，這種碼放方式容易造成倒塌，從而導致簡牘折斷。危難時刻，別人還沒來得及想到的，李學勤先生卻想到了，出於對事業的熱愛及高度的責任感，他奮不顧身，進入危樓逐盒將之平放在地板上，避免了倒塌折斷發生的可能。後不久，又裝箱轉移至安全處。此前不久，我亦曾和李先生及文物出版社攝影師王露女士一起赴湖北雲夢縣考察並拍攝剛出土的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我們考察了墓地環境及所有的簡牘，這批簡的內容包含了此前從未曾見過的大批秦律，有極高的學術價值，作爲專業工作者或許能比較容易理解它的內涵，但無專業知識者則不然。而當時地方文化館的同志要求李先生爲之做專題講座，受聽者卻參差不齊，既有幹部，又有工人，甚或還有當地的普通百姓，我們無不爲之擔心。開講後，李先生卻能用最通俗的語言、最恰當的比喻，講解秦律的意義；通過一封書信展現秦國普通士卒的感情世界，引人入勝，越講聚集的人越多，最後每一窗戶外都擠滿了人，大家都非常開心。恐怕祇有將廣博的知識、敏捷的思維與周全的安排三者緊密結合起來，纔能達到如此完美的境界，否則必將顧此失彼，陷入尷尬局面。

地震過後，“整理小組”的工作沒有停頓，我們曾住過故宮的武英門走廊，在明清檔案館、故宮西北角的城隍廟辦公。記得在條件最艱苦的時刻，山東師範大學的安作璋教授仍然和大家一起堅持進行睡虎地秦墓竹簡的整理。先生天性樂觀，豪爽大方，從不見愁。他腿腳有殘疾，平時皆須手拄拐杖行走，地震後住在故宮西邊，吃飯卻在東邊，路程較遠，往返時常常能堅持自己走一段，累了纔由我用自行車馱著，日子長了，交誼漸深，學業上曾給我許多幫助（先生尤其擅長秦漢史，很早時已將簡牘資料與秦漢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後來有一次我去濟南拜訪先生，盡情叙談之後，先生還讓師母親手做了許多好吃的上海菜款待，令我久久不能忘卻。

1977、1978年間，地震的影響尚未完全消除，“整理小組”還在故宮城隍廟辦公，十餘人一間辦公室，條件依然艱苦，業務卻迅速擴大，新增加了居延新簡、阜陽漢簡、吐魯番文書、新中國出土墓誌等項目，爲此經文物局申報，中央批准，時任副總理李先念親筆簽字，在“整理小組”的基礎上，籌備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與改革開放同步翻開新的一頁，而此前“簡帛整理小組”是由文物出版社代管的。

新單位成立伊始，許多東西需要置辦，尤其要購置必要的圖書，張政烺先生爲此

做過很大貢獻。先生經常帶我們逛琉璃廠古籍書店,由於先生對琉璃廠的底細很瞭解,與各書店的經理及工作人員很熟,對書更熟,還常常給我們講解版本目錄方面的知識,所以每次總能選購到一批有用的圖書,買後捆綁暫存原處,次日由我和甘肅省博物館的何雙全先生一起,每人騎一輛自行車把書拉回來,日積月累,逐漸形成規模。雙全比我年輕,除參加居延漢簡的整理外,許多雜事也幫著做,從不計較個人得失。記得後來古文獻研究室使用的大書桌,桌面寬廣平整,特別適用於簡帛整理工作,就是我們倆設計的,特意到京郊木器廠定做,搬回紅樓時,還是我們倆加楊樹森先生,每人一張背上四層辦公室,每張可是近百斤的分量,畢竟當時還年輕不覺得太累。

80年代初,大地震對簡帛整理的干擾基本消除,工作進入常規化,經批准我亦有機會再到北大進修提高。同時,古文獻研究室調入了改革開放後畢業的第一批研究生,增加了新鮮血液,亦有更多的知名專家加入出土文獻整理的工作行列,經常舉辦各種研討會,簡帛研究便逐漸步入顛峰。

(李均明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北京,100084)

